

蔡永良·著

语言 教育 同化

美国印第安政策
语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永良○著

语言 教育 同化

美国印第安
政策研究
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教育·同化: 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研究 / 蔡永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0

ISBN 7-5004-4210-6

I. 语… II. 蔡… III. 印第安人-语言政策-研究-美国 IV. H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3337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 www.csspw.cn](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2 5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当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时，人类检查自己过去是怎样对待不同的文明与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是怎样对待弱势文化的，被提到了日程上来。美国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的关系，在我看来，是最值得重新加以审视的。这是一次文明间进行交往的实验。

当英裔美国人踏上沿大西洋的北美土地时，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物质文化，即便他们的语言，也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发达的，应该在北美地区加以传播，以便为他们构建整个北美资本主义文明培植语境。另一方面，当时，北美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仍处在原始部落阶段，捕鱼与狩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大部分部落没有文字。印第安人与英裔美国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两个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相去甚远的文明。英裔北美居民代表了一个强势文明，而印第安人在这块土地上立即变成了一个弱势文明。当两者在北美土地上相遇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对英裔北美居民与印第安人都是新的问题。然而，强势文明总是居于主动地位。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开国先辈曾主张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杰斐逊曾设想了这两个文明的关系的前景。英裔美国人教化与同化印第安人，办法是美国人把印第安渔

猎文明提高到农业文明，教会他们耕种，而印第安人把广袤的、供渔猎的土地让给美国农场主，满足他们的土地扩张要求。杰斐逊设想，这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这是杰斐逊理想主义在种族关系上的表现。

现实生活不是如此。有着悠久的种族传统的印第安人没有照杰斐逊的设想去做，交出土地，从事农耕。美国人则不愿等待。美印关系的第一幕是美国人一片一片地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一批一批地杀戮印第安人。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结果是印第安人口锐减，被驱赶到俄克拉荷马等远西地区的“保留地”上去。当我 20 年前在纽约印第安人博物馆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张被白人撕下的印第安人头皮时，真是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人类不同种族的关系竟如此的野蛮和可怕，比之丛林里野生动物的弱肉强食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第安人没有被斩尽杀绝，因而教化与同化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其后的美印关系史基本上是同化印第安人的历史。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加紧了对印第安人同化的进程。1887 年的《道斯法》与 1924 年的《印第安人公民法》标志着这一同化进程。但同化虽然取得进展，也遇到了印第安人的强烈的反对和反抗，有良知的白人也对如此的同化提出异议，于是联邦政府又试验让印第安人实行自治与自决。这就是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及“印第安新政”。从此，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或是同化，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或是自决和自治，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与部落生活方式。正如历史学家布卢姆所说：“国家对于印第安人的政策一直摇摆于自治和同化这两个目标之间。”（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第 698 页）

60 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高涨的年代。实际上，这是美国各族裔探索在一块共同的国土上如何共存与共处

的运动。它预示了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即将来临。作为北美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自然有权利提出这样的问题。在 60 年代民权运动及以后，印第安人加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与语言、文化传统的斗争，以便成为美国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这将是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新的一章。这一新形势、新语境对人文科学提出挑战，要求学者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文明间的关系加以研究。《语言·教育·同化——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研究》一书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是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一项成果。

顾名思义，《语言·教育·同化》不是一本全面论述美国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相互关系的历史，它的主题是美国文明如何利用自己的强势语言——英语——去消灭与替代印第安语，从而达到同化印第安人的目的。

当代历史学家专注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思想史的研究，惟独对语言与语言文化缺乏兴趣，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误读了语言，把语言看作仅是交际的工具、对话的工具。近几年来，西方一些有见识的语言学者中肯的呼吁历史学家充分重视与关注语言，在历史研究中，把语言视为一个重要元素。本书作者认可了这一见解，把语言提到如此的程度，认为它是实行种族同化的一个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手段，说：“同化他人最有效的途径是语言”；“语言的同化是超过军事征服、异族通婚等更深层次的同化。”《语言·教育·同化》一书的关键词是语言，这是本书提供的主要的、也是最宝贵的学术资源。该书围绕语言阐释了一部两个文明交往的历史。书中告诉我们：英裔美国人是如何继承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优越论，视自己为优秀种族，美国英语为优秀语言，并具有统一其他语言的品质与能力。书中引用 16 世纪末英国诗人萨缪尔·丹尼尔的一首诗来揭示 16、17 世纪英国人已经具有对外部世界扩张语言的欲望，正是这一欲望成为后来用语言来实现

种族同化的最原始、最持久的动力。事实上，当第一批移民从英国出发时，他们就被赋予使命：用英语教育印第安人，让他们学会英语，忘记母语，以便接受基督教文明。19、20 世纪的惟英语运动与双语运动是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的实践。

书中告诉我们，惟英语教育与双语教育是联邦政府实行同化政策的主要手段。在“同化论”者看来，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与两种文明的关系的途径是印第安人接受美国文明，而学会英语是先决条件。惟英语教育的特征是强制性地接受英语，放弃母语。“把他们的野蛮语言抹掉，用英语取代之。”书中以翔实的资料展示了惟英语教育下，印第安人心态的变化，那些接受英语与美国文明的印第安人处于两种文明将他们撕裂的两难境地。由于语言的取代，印第安文化在加速灭亡。书中搜集的案例，颇有史料价值。这些案例使我们懂得，文明间的融合是多么艰难，决非一蹴而就，在未来的多元文化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积极而谨慎地对待文明间的交往与融合，任何简单的、自以为是的做法都是有害的。

用语言进行同化的另一个选择是双语教育。虽然惟英语教育向同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但无数事实证明，“同化印第安人可以通过一代人的教育得到解决”是不可能的。同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双语教育比惟英语教育更人道与有效的方法。在 60 年代民权运动与对西裔等少数民族裔开展双语教育的环境中，对印第安人的惟英语教育向双语教育转变。不管决策人与双语教育的拥护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双语教育在客观上有利于母语与印第安文化传统的保留。从此，惟英语还是双语成为同化印第安人的两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如何让印第安人更快地接受英语的方法问题，但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还是一个要不要让印第安人在接受英语与美国文化价值的同时保留母语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是文明间实行交融后各族裔的取向问题。

本书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关于印第安文明的重大信息：印第安语在急剧地衰亡。在欧洲人到达北美前，这里的印第安语约300—500种。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仅有一半存活下来，而且还在急剧地衰亡。在语言衰亡的后面，真正严重的后果是这个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走向灭亡。因此，进步人类与印第安人自己自6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90年国会通过《美国土著语言法》以来展开了挽救印第安语运动。《美国土著语言法》是两个文明发生接触以来，联邦政府一项关于印第安人的最开明的立法。它标志着联邦政府对印第安语政策的转变，即从消灭印第安语的政策转变为维护印第安语的政策，这为这个古老的语种得以生存提供了一线希望。虽然如此，挽救印第安语运动仍任重道远，凶多吉少。作者不无理由对此表示忧虑，把大希望给予印第安部落与社区的自身努力。

这就是《语言·教育·同化》一书为我们讲述的一个文明间冲突与融合的故事。故事还没有结束。挽救印第安语运动会带来种族的振兴吗？印第安文明怎样融入美国文明，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期待蔡永良博士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不仅勾勒了一部语言同化史，为重写美国史与世界史增加了新的篇章，而且论说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维护语言多样化的理念。书中引述了大量西方语言学论说，这是作者两度赴英访学的收获。这些新论说可能在国内语言学界还少有介绍与评论。例如，在《印第安语的衰亡与挽救》一章里，作者介绍了语言生物学理论和语言社会学理论，并用后者解释印第安语衰亡的原因。再如，在对“语言相对论”的述评时，引证了当代众多社会科学大师的论述，指出“这些理论最基本的核心是，语言具有影响与改变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能动作用”。因此，各国在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同时，务必要爱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与语言环境。书中实际上贯穿了一个理念，即维护语言的多样化不仅

是保护语言这一人类最宝贵的遗产的首要原则，而且是实现全球化、全球和平交流的重要途径。

重读蔡永良博士的学位论文，引发了我如上的联想，也引起了我对往昔的回忆。我与永良的认识，纯系缘分。他是坐落在江南名镇常熟一所大学的外语教师，当年，他是来报考英语专业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不巧，他要的那位导师正值出国访问，暂停招生一年。南大研究生院介绍他读美国文化，于是他成了我的弟子，从此，我们共度切磋学术的美好时光。读者在他的书中当能发现他充分发挥语言学者的专长，尽情运用语言学来论证他的见解，使论著具有新的视野，以致读者把它视为一本社会语言学的著作未尝不可。但永良也有他的弱点，缺少史学训练。这确实限制了他、困扰了他。当他的第一稿拿给我看时，我难于对它表示认可，只能请他推倒重来，重新设计题目、拟订提纲、补充材料、酝酿思路，其间的困难与甘苦是不难想象的。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思考与笔耕，终于完成了这篇学位论文。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本课题是一项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一段辛涩的路程，是我在感到交叉研究之艰难的同时，领略了宽泛而又深刻的学术熏陶。本文的写作使我经受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锤炼。”看到他这一稿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记得在讲完我的意见时，我对他表示，这是他学术事业的新起点。我特别希望他把印第安研究继续下去，为在中国建立“印第安学”而努力。

印第安人是一个古老的人种，但印第安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的学科。杨振宁教授在南京大学作过的多次学术演讲中，每次都谆谆告诫青年学子，学问要做得有前沿性、开创性。他的话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该说都是至理名言。在今天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时代，研究文明间的关系是极富学术性和现实性的，是人们关注的大问题。近几年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在世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就是明证。中国学界普遍地对

“文明冲突论”持有异议。我认为，亨廷顿的错误不在于他说了文明有差异或冲突，而是他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他在当今时代，还强调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是人类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人类曾试图用杀戮、用强制性同化等手段使弱势文明接受强势文明。这一试图在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中表现得真是淋漓尽致了。难道我们还要让历史重演！印第安研究就是要以印第安人为研究对象揭示文明冲突的根源与不幸，探索人类当今将如何处理文明间的关系，不同的文明在这个地球上如何和睦相处与渐渐融合。

在这方面，饱经文明冲突的中国人，已经找出一条弱势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文明的路子，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使国家同国际接轨；开放，使华夏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之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人类又一次进行的文明间关系的试验，它的成功将会给人类如何妥善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提供宝贵的经验。

这一试验也悄然发生在本书作者蔡永良的家庭。90年代中期，永良被选派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学习西方的语言学，像众多学子一样，这是他第一次实地接触西方文明。他的夫人章世玉，一位江南古镇的情倩女子，独具胆识，倾其储蓄，带着女儿也来到这个外部世界。一年后他们回到常熟，带回的仅是一架相机。不，他们还带来了新的视野、新的思维。年仅十岁的女儿蔡恩告诉母亲：“世界是多么的大，常熟太小了。”文明的融合，悄悄地在这个中国家庭发生。这些都是蔡夫人来参加授予蔡永良博士学位的仪式时，亲口对我说的。那次，她从常熟，他们的女儿从西安交大同时赶来南京。我知道，这一举动已有西方文明的成分。西方人重视教育，经常一家人来参加子女或亲属的毕业典礼，这在西方已蔚然成风。

美国与中国在不同时代进行了文明间关系的试验，为我们从事印第安研究与文明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话语，

也给了我们启示。文明间的交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要求，当我们谴责错误的交往方式时，不要否定交往与融合本身；当我们对历史上弱势文明表示同情时，不要为其落后的、封闭的生活方式加以辩护。一切都应理性地、历史主义地来看待。我们的立足点是维护进步、扶助落后；提倡交往，反对封闭；褒扬平等，摒弃歧视。在这同一世界上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只有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进行交流与融合，才能真正地将人类文明不断推向进步。

写上这些想法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进行交流，且以为序。

李庆余

2003年9月识于南京大学文科楼

Language, Education, and Assimilation:

The U. S. Government Policies on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since the Mid 19th Century

Abstract

The mid-19th century saw the most crucial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hites and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ess than a century since its founding, the United States had fulfilled its target of interior expansion from the original 13 states crowding at a narrow strap along the Atlantic coast in the East right across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o the Pacific coast in the West. Along with the westward expansion, American Whites with English as the mainstream, formed an English-speaking culture, assimilating successfully the rest of Europeans in the new-found land, and pushing most Eastern Native Americans from their familiar homes into wild areas west of the Mississippi River and then rounding them up into narrow pieces of reservations. Though the condition,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ad become hopeless by then for the Native Americans, now no competitors for the ever-growing American Whites, the former still remained a problem for the latter. After the Civil W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ted no time to start to solve "the Indian problems" with two policies at its priory position, one being the "land severalty policy", which meant to shatter the Indian trib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other

being the "English-only education policy", which attempted to assimilate Indians thoroughly by way of "blotting out barbarous dialects" of Native Americans. With this historical period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urve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ies on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up till present to examine their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ng Native Americans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reference to the survival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ultures.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U. S.,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sha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is the period from the "Peace Policy" advocated by the Grant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up to the Meriam Report in 1928. The second period starts with the Meriam Report till the end of the 1980's,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ssed 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 Act,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period that proceeds onto the present.

The first period is pretty much a period of all-out assimilation, where the Indian language policy, in the form of English-only instruction rules at schools for Indians, played a key role. It was believed that school education was essential to melt Indian youngsters into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replacement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by English was key to its effect. Thus English-only instruction rule was strictly observed, native tongues were harshly forbidden, and any student violating the rule would be severely punished in almost all the Indian schools, with Carlisle Indian School run by Lieutenant Richard Henry Pratt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model. The English-only education policy of this period rendered a devastating effect upon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by greatly undermining their prestige and continuity. Consequently, the pace of assimilation of the Natives into the mainstream was quickened to a great extent.

With a harsh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Indian boarding school system, the Meriam Report inaugurated a turn from the English-only education policy to that of experiment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which was furthered with John Collier's Indian New Deal in the 1930's emphasizing on Indian self-determination and governance. The break out of World War II, however, unfortunately suffocated much of its ambitious plan. The Civil Right Movement and other anti-mainstream agitation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in the 50's and 60's seemed to have caused the White society more tolerant to minority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e U. S., The direct effect in concern is the passag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ct in 1968. Although it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EP students, easing them into the formal English education by a limited amount of native language instruc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 Act left a considerable room for Indian tribes and other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o maintain nativ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rough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best example is the Rough Rock Demonstration School that was fully tribal controlled and the education was fully maintenance oriented. It is this typ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linguistic and culture maintenance that caused much angry objection from the White society, which simmered into a big fuss called English-Only Movement starting in the mid 1980's till present. Therefore, the second period of U. S. government Indian language policy development is a mixture of assimilation orient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on both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Native Americans.

On October 30, 1990, President George Bush signed 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ct into a public law, which marked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U. S.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Indian languages. The Act acknowledges the unique status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their essential functions to the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

previous mistreatment of them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hite society. Based on such acknowledgement, the Act issues as government policy to “preserve,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tive Americans to use, practice, and develop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The passage of the law has greatly encouraged 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Revival Movement,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n since the 1960's, and without doub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rvival of many dying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The genuine significance, however, has been drastically diminished by two facts. First, owing to the constant oppress and peripheriz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policy and White society,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re declining so rapidly and seriously that they are almost beyond the point of rescue. It seems too late to issue such a government policy. Second, English-only “linguistic culture”, referred to by Harold Schiffman, an outcome of the philosophy of Anglo-Conformity that is deeply rooted in Euro-American civilization, dies hard. It frequently prevails the language policy and linguist behavior of the country. The English-Only Movement has had more than 20 states issue laws making English their official language, and finally led to the signing of the English Acquisition Act by President Bush at the beginning of 2002, which virtually terminated the 34-year-old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These two factors not only decrea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ct, but also post a tremendous hardship for the tribal effort to maintain their tradi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 the only hop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so far.

The core of the arguments in conclusion is that language is the key to assimilation. From the assimilator's viewpoint, unification of languages means unification of cultures, hence the completion of assimilation. From that of the assimilated, language is the base, the carrier, and the way by

which the very culture exists and develops. Without a common language, the culture, and the nation itself, is hardly able to survive and flourish. Therefore, both parties are bound to turn to language for assimilation or self-maintenance, an essential point around which the U. S. Government policy on Indian languages has developed since the mid 19th century.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北美印第安语	(29)
第二章 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	(51)
第三章 惟英语教育的兴起	(80)
第四章 普拉特的印第安教育	(111)
第五章 惟英语教育的反应与后果	(143)
第六章 “梅里亚姆报告”与“印第安新政”	(172)
第七章 印第安双语教育	(202)
第八章 双语教育的反动	(246)
第九章 印第安语的衰亡	(278)
第十章 印第安语的挽救	(297)
结语	(354)
附录	(368)
参考文献	(377)
后记	(405)